

## 忆孙中山先生思想对我们兄弟的影响

张文心<sup>①</sup>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是学习孙先生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统一国家、建设国家的宝贵遗训。这里，我回忆到六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东京青年会国民党总支部举行一次盛大的纪念会，并为配合纪念活动出了专辑。我曾在专辑上写了一篇短文，主要内容是，纪念中山先生就要向他学习，学习他对内争取和平统一，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及“适应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牺牲后，使我对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无比的崇敬和向往，这对我一生的思想和做人道义影响至深。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孙先生北上路过日本神户。东京、大阪、神户三埠的国民党组织联合举办了神户欢迎会，孙先生在演讲中，希望所有亚洲被压迫民族要进行种种独立运动，要摆脱欧洲人的束缚，不做欧洲的殖民地，要做亚洲的主人。我虽没参加这个会议，但与会的朋友都向我作了传达，并特别强调了孙先生国内和平统一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我听到这些话感到十分振奋，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以后，在中山先生言

<sup>①</sup> 张文心现为南京市政协副主席。

行启发和教育下，我于一九二五年底在东京士官学校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当时在东京的国民党总支部有两个，一个是左派，设在东京神田区中国青年会内，是拥护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一个是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设在东京西巢鸭区，他们反对三大政策，并暗中勾结东京警视厅，把中共东京支部当作敌人。

我参加了东京青年会国民党左派总支部。在未进士官学校之前，在成城学校读书时，就结识了翟宗文、濮德治、童长荣、谢嗣育、方治、陈访先、汤志先等人。他们有的在左派支部，有的在右派支部。右派也要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所结识的这两方面人，在私人交往中大都还谈得来，经过思想斗争，加之我大哥张治中当时在革命政府任职，又是黄埔军校教官，他比我较早接近中山先生，并拥护中山的三大政策，因此，我就决心加入青年会支部。当时支部的负责人有金诺、何恐、郝兆先、翟宗文等，夏衍任组织委员，谢嗣育任宣传委员。西巢鸭支部头头有方治、陈访先、汤志先、路锡祉、卢弓召、郭小东等，他们以后大多当了官僚政客。而青年会中的同志，以后有不少被杀害成为烈士。如郑汉先被蒋介石杀害于武汉，王步文被杀害于安庆，何恐被杀害于汉口，童长荣领导东三省人民抗日，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于辽宁。后在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南京理发店偶遇谢嗣育，彼此都惊讶，我问他一九二八年我离开东京后的情况。他说，“四一二”后，左派支部在日本处境很困难，我和王树声、濮德治被日本警视厅逮捕，因证据不足被驱逐出境，押送到上海。时上海为国民党右派控制，由于得到上海地下党的支援，船到吴淞口，我们就下舢板船脱离了险境。

我由于受了中山先生思想的影响而参加了国民党和东京国民党左派支部，这对尔后的几十年在思想上有一定的影响。后来在

“剿共”期间，国民党围剿军鲍刚邀我当团长，我没有去，汤恩伯邀我当补充旅长，我也没去。我同我大哥张治中一样，在南京军校任教十年，始终没有带兵与共产党打过仗。但在抗日战争中，我参加了“一二八”、“八一三”和中原会战三大战役。

我三哥张本禹，年方弱冠，只身远走广东参加中山领导的护国军。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在“四一二”政变时，他曾经在武汉掩护学兵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帮助他们脱离武汉。一九三〇年期间，调南京中央军校任卫兵营营长，未久，调八期学生总队任区队长、队长。他在政治思想上坚持进步，宣传孙中山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使学生受到教育。

一九三六年秋，傅作义将军指挥部队进攻盘踞百灵庙之日军，本禹奉令率十二旅一个团兵力驰往增援。激战三日，日军及王英、李守信等部伪军节节溃败，向热河方面逃遁。我军乘胜收复百灵庙，造成绥东大捷，三哥也得到上级传令嘉奖。此后，他又多次参加作战，奋勇登先，于一九三七年南口战役中牺牲。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抗日革命烈士。

二哥张震中，早年受中山学说熏陶和辛亥革命启示，参加护国军，后以战功考入云南讲武堂，毕业后任职桂军军官学校。中山先生在黄埔创办军校后，他毅然带领部分学生投身黄埔，并担任学生区队长。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开学，他亲眼看到全校青年学子兴高采烈一致拥护中山先生，并亲聆中山先生讲话，感到很受鼓舞。

当北伐军胜利占领上海之后不久，二哥感到国民党右派将有反共阴谋，认为这与孙中山先生的政策不符，遂毅然辞去上海警备司令部的职务，转到南京国民政府参军处工作。不久，上海便发生了“四一二”事变。

抗战后期，我二哥调到西北工作。抗战胜利后，眼见国民党内一片反共乌云，他不肯随声附和，决意辞职赴沪闲居。解放后，他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

我大哥张治中，于一九一六年自保定军校毕业，分配到安徽军阀部队。因向往中山先生革命精神，冒着生命危险到广州投效革命军，后历任国民党军政要职。

一九二四年，他在黄埔军校任教时，就结识了周恩来先生，并与恽代英、高语罕、熊雄等共产党人过从甚密，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被国民党右派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北伐军由广东出发时，张治中任总司令部副官处长，掌管人事和组织工作。他曾向蒋介石推荐周恩来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以利两党合作，未得蒋采纳。后他谈起此事，认为在北伐军统帅部中，没有周恩来参加是一大损失，并引以为憾。

一九二八年，张治中赴欧美考察军事教育，回国后，认为蒋介石的对外妥协让步，对内积极剿共政策，不符合孙先生遗教，深为不满，遂坚决辞去带兵的职务，请求到中央军校任教育长。因此，蒋介石打了十年反共内战，张治中在南京办了十年军事教育。他一生始终没有领兵同共产党打过仗，可在抵御外侮中却不甘人后，“一二八”和“八一三”战役中，他两次统兵抗日，给日寇以重创，赢得了国际上的称誉。这些实渊源于孙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特别值得回忆的，是我大哥张治中遵循中山遗教，坚持国共合作，真心诚意为国内和平而奔走。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我大哥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亲往延安迎接，并把毛主席安排在自己寓所“桂园”办公和休息。毛主席返延安后，亲送大哥上飞机回重庆，并对他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

一九四六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周恩来、张治中组成三人小组视察停战情况，到达延安时，大哥在欢迎会上风趣地说：“希望你们将来写历史时，不要忘记我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全场的掌声和欢笑。毛主席插话道：“将来也许会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次呢？”大哥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迁到南京去，你也应该住在南京，延安我不会有四到的机会了。”

三人小组到达武汉时，周恩来因李先念将军所部经费困难，商请大哥设法接济。大哥当即与武汉方面主管军需的负责人商量，对方有难色，我大哥解释说：“现在协议已签了字，全国进入两党合作，中共部队的薪饷即将由政府方面发给，先借一点，没有关系，如你们怕负责，作为我借的好了。”

一九四五年冬，大哥张治中调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周恩来和邓颖超面托他入新后，设法营救被盛世才关在迪化监狱的一批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大哥一到新疆，不顾政治上的风险，派人查明有一百三十一人，当即全部释放，并派专人专车护送到延安。

综上所述，我们兄弟之所以能在工作中尊重客观现实，追求真理，处处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都是与中山先生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我虽已耄耋之年，但愿为祖国统一大业，完成先兄张治中未竟之志，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一九八六年二月